

20
世纪的中国

学术与社会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文学卷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文学卷

韩毓海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韩毓海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

ISBN 7-209-02677-0

I .2... II .韩 ... III .①社会科学 - 科学研究
- 中国②现代文学 - 研究 - 中国 IV .C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217 号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文 学 卷

韩毓海 主编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4 插页 36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9-02677-0

I·36 定价：28.00 元

出版说明

新的世纪即将来临，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

20 世纪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进步，经济发展，社会变迁……需要回顾和总结的东西的确很多。我们编写出版《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目的就是试图对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进行梳理、阐发和总结，希望能为下个世纪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及社会问题提供一套有价值的参考书。

本书从提出选题到最终付梓，历时三年多。其间，召开了两次编写会议。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汪晖、李培林、葛兆光、王守常、汪丁丁、孙立平、朱苏力、李强、贺卫方、高名潞、罗志田、韩毓海、黄平、王名贤等专家学者，以及山东省出版总社、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两次编写会议就编写出版《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统一了思想和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原定八卷，包括人文科学四卷（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四卷（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成书的只有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和法学五卷。作为策划、组织者，总感到有些遗憾。

参与本书编写的作者都是活跃在当今学术界有影响的人物，是各个学科的带头人。能够组织起这样一支“过硬”的作者队伍，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感谢他们对本书的编写和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与积极合作，特别是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和

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敬佩。这也是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含量和学术价值的重要条件。

由于一百年来各门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性，也由于各卷作者的风格不尽一致，所以全书的体例并不强求统一，这反而使得各卷具有了不同的特点和风格。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关心一百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读者来说，将是一件颇有助益的事情。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

1
2
3
A
B
A
B
A
B

序

描写“20世纪”文学知识形成的历史，描写这种文学知识的大厦是如何在时间和历史中构造起来的，可以采用的方法无疑有多种，本书采用的方法只是其中的一种。

根据这种方法，文学知识的形成和构造方式，仿照了现代知识构造的蓝图，或者就是这种现代知识整体的一个部分——正象盖楼需要一些关键的材料——木材、水泥、钢材等等一样，现代知识大厦的构造取决于一些关键性的观念和语言词汇——如“20世纪”、历史、现代、科学、理性、民族、国家、革命、劳动、生产力、科层制、人（人道主义）、性别等等。这些关键性的词汇，每当我们讨论现代知识的问题时，就会不可避免的采用它，我们通常认为它不过是一些自然的、天然的工具词汇——但是，实际上，它们在不同的历史场合，不同的历史处境中的含义并不相同——正如尽管盖楼几乎都要用木材和水泥，但是每一座楼看起来没有完全相同的一样。——尽管我知道这种比喻很不确切，但是对说明问题实际上却很有帮助。

文学知识形成的历史与这些关键的知识词汇密切相关，但是表述方式并不相同，比如“民族”的问题之于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劳动”的问题之于“审美创造的主体性”，“生产资料”的问题之于社团、刊物、文学活动等等。有些问题，如“性别”的问题在其他知识领域里的讨论可能比较隐讳，但是，

在文学的知识领域里，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使讨论变得相当公开。

我不想夸大这一卷的特殊性，但是文学知识的构成方式其实无疑是非常特殊的。我在这里根本不想坚持“纯文学”或者“为文学而文学”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知识规划的一个产物。我想说的其实是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现代知识框架往往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在确定的概念与确定的现实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这个假设——我想指出的恰恰是：这个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科学知识大厦基石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文学，有相当大的讨论余地。在某种意义上，文学的方式甚至就是在“不确定的概念与不确定的现实之间建立不确定的关系”，如果读者对这个在我看来是十分重要的现代知识问题感兴趣的话，他（她）能够对本卷与其他卷作比较阅读就再好不过了，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之一朱光潜曾经基于这种反思现代知识框架的构成方式的立场，将不同于那种方式的“文学的方式”称为“形象思维”——这个概念已经被文学理论界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本卷所进行的分析会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离了解这位去世还不算太久的大师的论断的真实含义还差得远，这就不用说其他离我们稍远的重要的文学知识了——为了回应这种轻薄的历史和知识的健忘症，我认为本卷的写作可谓恰逢其时。

一群“文人”在所谓“世纪末”从事这样的工作难免感慨万千。这种感慨万千使在一部著作完成之后再来说几句“题外话”不可避免。但是我想我这几句“题外话”也许对许多关心所谓“20 世纪”史的人来说应该倒是“题中应有之义”：无庸讳言，对我而言这种“感慨万千”包含着对一种历史态度的反感和不满，所谓“20 世纪”的历史经常被从整体上看作“两头开放中间封闭”，或者两头都是“黄金时代”中间却是“大塌方”。

“世纪末”的历史学家往往习惯于无论是民间戏剧还是通俗电视剧“编剧”思维的束缚，这种通俗思维无可避免的要把“开头”和“结尾”看作“光明”而“中间”必然是“曲折”甚至“倒退”，这实际上既不奇怪，也不高明，当然从来也不能算作历史和学术的严肃。本卷在“20世纪”的“中间”，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这一部分大费了笔墨，还不仅仅是表达对“通俗电视剧”的编剧式历史思维的嘲讽，而且正是为了严肃的对待历史和克服随处可见的历史遗忘症。

和其他各卷的作者一样，我们一致认为：现代中国的兴起是人类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正是对这个伟大实践的敬意和身为这个伟大实践后继者的自豪，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而我们还认为：要想了解这个旷日持久的现代实践的丰富和复杂性，了解中国人对这个现代新世界的认同，阐释和文化实践的历程，就离不开对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的了解。就那些怀着高尚情操而对这些实践感兴趣的人们来说，这种实践不仅仅是一种对新世界的乌托邦热情，而且也是对现代困境中人、社会和历史以及劳动的分裂、异化以及匮乏的质疑——文学正是伴随着这种强烈的热情与沮丧的活动。——当然，新文学观的确立，同时也表现为一种非凡的智性的努力，因为有关现代文学的知识，是在与一系列更通常的知识，或者“话语”的关系中形成的，例如：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唯物主义等等，它依靠这些知识来发展自己，也通过对这些知识的批判来申述自己。

本卷通过两个互相联系的线索叙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是它与现代知识的关系，一方面是它的现实处境及其与现实处境的关系。这种描述揭示出，关于现代文学的性质、本质，或者“什么是新文学”之类问题并非一个普遍的命题，相反，这是一个在一般现实和知识话语的现实中

不断修改，不断形成的历史的命题。

这当然同时意味着我们自己在这里的看法和工作也是历史的，甚至是暂时的。——这不完全是因为资料的原因——因为实际上没有人可以占有所有资料；这也并非因为我们资质不够——因为任何人的资质都不是完满的——而是现代中国的伟大实践还远没有结束，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历史的终端——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来叙述这些历史的。

这项工作得以初步完成，有赖于以下学者艰苦的和有创造性的合作劳动，他们是：清华大学的旷新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顾海燕，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蒋晖，北京大学的韩国学者申正浩以及我本人。我的合作伙伴和我本人一样，轻松相信自己毫无疑问是本领域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说无非个人所思，并无那么强烈的为“学科”续经立传的抱负或者所谓“学科带头人”意识。但是，在阅读了他（她）们所提供的文本之后，我还是要说他们在追求运用观点和把握材料的统一方面迈出了脚步，对中国史研究，尤其是文学方面的历史研究来说，这一脚步将被证明是一个开端：这一脚步多少暗示了传统中国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变化——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领域里，一般的状况是中国人出“材料”，西方人出“理论和观点”——这种历史领域里的知识生产的“来料加工”方式是“中国”在这个现代世界中总体异化状况的反映。而要想使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真正属于世界，这种状况就是不适当的，也是最终不可能继续下去的。

在从事本卷写作的过程中，我们无时不意识到在这个领域里有众多的学者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的脚注实际上多少反映了这些贡献，尽管如此，那还是挂一漏万。我们尽可能的尊重前人的研究，但是，更加尽可能的是在各方面坚持自己的判断和观点。无论这些观点可能遭到什么样的反对，只要我们

认为它是深入的和站得住脚的，我们就坚持，并且不怕那些反对。

本卷是《20世纪中国 学术与社会》的一部分。这一远见卓识的跨学科的工作，使本卷作者受益匪浅——能够与其他学科的，可能是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起工作，这种工作尽管艰苦，但是十分令人愉快和感到自豪，这种愉快和自豪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工作。——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晖研究员的发起、组织和远见卓识的意见，起码是本卷的写作将不可思议，今天，当我们终于可以回首两年前这一工作开始的时刻时，提到他的支持，是适当的。没有这种支持，本卷的年青学者将不可能担任这项既是研究，同时也是学习和提高自己的工作。

特别应该感谢山东出版系统的领导、编辑以及虞静女士一如既往的支持这项工作。没有这种支持，本卷将无法与读者见面。

至于本卷必然存在的各种问题，完全由我负责——尽管我的这种工作不过是在参与者之间必要的沟通——但是实际上，即使这样的工作对我而言也未必是称职的。

韩毓海

1999年8月24日于北京

《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常 朱苏力 孙宝林 李培林
汪 晖 张立升 张士宝 罗志田
贺卫方 黄 平 韩毓海

目 录

序	(1)
---------	-----

第一篇 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1900——1927)	(1)
-----------------------------------	-----

第一章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	旷新年 (1)
----------------------	---------

第二章 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	(31)
-----------------------	------

第三章 民族国家的文学	(58)
-------------------	------

第四章 人的文学	(88)
----------------	------

第五章 科学主义、人文主义与翻译的现代性	申正浩 (112)
-------------------------------	-----------

第二篇 现代文学的现代处境(1928——1948)	(144)
---------------------------------	-------

第六章 文学与意识形态	旷新年 (144)
-------------------	-----------

第七章 现实在文学中的呈现	(178)
---------------------	-------

第八章 民族抗战与文学	(207)
-------------------	-------

第三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1949——1989)	(231)
----------------------------------	-------

第九章 革命中国的兴起及其话语纷争	韩毓海 (231)
-------------------------	-----------

第十章 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	(299)
-----------------------	-------

第十一章 人文主义话语和主体性理论	顾海燕 (381)
-------------------------	-----------

第十二章 当代写作中的性别话语	蒋 晖 (438)
-----------------------	-----------

第一篇

现代文学观的发生与形成

1900——1927

凌廷堪曾经论学术之变迁说：“学术之在天下也，阅数百年而必变。其将变也，必有一二人开其端，而千百人哗然攻之；其既变也，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从之。夫哗然而攻之，天下见学术之异，其弊未形也；靡然而从之，天下不见学术之异，其弊始生矣。当其时亦必有一二人矫其弊，毅然而持之。及其变之既久，有国家者，绳之以法制，诱之以利禄，童稚习其说，毫厘不知非，而天下相与安之。天下安之既久，则又有人焉，思起而变之，此千古学术之大较也。”^①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②

① 凌廷堪《与胡敬仲书》，《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4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第一章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

20 世纪，中国处于社会历史的转型期，它同样也要求知识和学术的转变与之相适应。20 世纪中国与历史传统产生了最根本的决裂，变化成为了 20 世纪的鲜明特点。这种变化开始是以“托古改制”的形式，最终公开以革命的方式，形成了强大的现代潮流。而文学既反映了这种变化，又推动着这种变化。

1917 年文学革命的发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崭新开端，文学革命产生了“新文学”，它与“旧文学”，即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发生了深刻的断裂。然而，文学革命又并不是在五卅时期突然发生的，五四时期所发生的许多重要的转变是在晚清开始启动的。在晚清文学革新运动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提倡和阐述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使传统的文学知识得到了不断的更新。新的文学运动又是新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中国现代的文学运动的发生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事件，它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历史、思想、文化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的文学经验中包含着异常复杂的内容和强大的张力。在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转型中，文学成为了一种对于经验的有力整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于现代世界的有效的总体的经验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将中国现代包含着激烈的、复杂的矛盾冲突的经验纳入到了现代文学经验之中。中国现代文学在中国现代知识构造中处于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地位。它成为了中国现代的一种“神话叙述”，它对中国现代世界观的塑造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巨大的解释能力，中国现代文学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世界观的构造和形成。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异常

复杂的经验，它是不同话语和不同知识的不断缠绕与展开。从来没有一种文学与现实具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也从来没有一种文学对于现实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更没有一种文学包含了如此矛盾的观念。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历史政治的内容和压力，文学被各种复杂的力量推到了一个中心的地位。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晚清文学的革新

中国具有一种稳定而强大的文学传统。然而，在中国传统的知识中，文学并不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是由经史子集所构成的。文学包含在集部里，相对于经史子来说，列于集部里的文学是一种低级的处于附庸地位的知识。在中国文学传统的内部，中国传统的文学主流是诗文，由于诗歌和散文的不同功能，又形成了文学经验的各自不同的范畴与传统，并且因而处于不同的价值地位。长期以来，散文形成了“宗经”和“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与“散文”的崇高传统不同的是，诗歌相对来说是较为个人化的文学经验——“诗言志”和“诗缘情”，个人化的诗歌相对于散文处于次要的地位。在中国的历史里尽管有“文苑传”，但是纯粹的文学作者并不真正受到重视，也就是说，实际上文学主要是作为一种士大夫阶级的个人修养和风雅。在清代，由于汉学的实证主义知识权威，文学经验更受到排斥和轻视。直到今文经学的兴起，文学经验才被重新激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西方思想的强大冲击，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以及传统经典处于急剧的崩溃过程之中。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1900年“庚子国变”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和世界观。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之后强大起来

的日本打败了，中国面临严重和深刻的民族危机。这种民族危机不仅造成了传统政治制度的危机，而且导致了中国意识形态的危机。康有为以汉学考据形式出现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尤其是谭嗣同的《仁学》，用传统经学的语言和形式强烈地表达了现代历史的要求，用传统的语言和形式表现了现代性本主义的内容，对于传统儒家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抨击。严复在《救亡决论》中说：“时局至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啜嚅儒儿，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①“变法”以至“变教”成为了解决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因此，造成了一个“变”的时代。康有为说：“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变，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严复在甲午战争以后翻译的《天演论》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成为了影响 20 世纪中国的最重要的文献。严复根据进化的原理指出：“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如果说有不变的规律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是天演的规律，进化的规律：“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③严复将中国严重的危机表述在先进的“科学规律”之中，因此，这种现实的危机和“科学知识”的结合有力地摧毁了传统中国的世界观和保守主义。

1900 年成为了一条重要的界线，从 19 世纪末的“西学中

① 《严复集》第 1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1 页。

②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康有为政论选集》，中华书局版，第 211 页。

③ 严复《〈天演论〉导言》，《严复集》第 5 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397

源”到20世纪初的“中国人种西来说”说明中国知识界对于传统信仰的崩溃。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在中国知识界开始产生了强烈的落后和危机的意识。“改变中国”，即改变中国在现代世界上的不适应状态成为了现代中国的主题。随着20世纪到来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失望，大规模的留学运动、革命运动的高涨和“欧风美雨”的现代洗礼。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产生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一个世界上。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现代的文学启蒙运动以及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式和独特内涵。中国现代文学的变化正是围绕着现代中国的变化而发生的，并且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性。与中国古典文学相比较，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了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意义。这是一个旧世界的崩坏和新世界的建立的过程，与此同时是一个旧知识的崩溃和新知识的发生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作为想象性和叙事性的文学在现代世界观和现代知识的重构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西方入侵的不断深入和危机的不断深化，传统的世界和传统的世界观在急剧的不断的崩溃。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传统世界观的结构性崩溃，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转变成为了“变法”的要求，于是发生了戊戌变法这一崭新的现代社会政治运动，开始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发生反省和批判。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变革从器物层面的变革深入到了制度变革的层面。戊戌变法运动把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推上了政治舞台。在变法运动的舆论宣传中，文学开始受到重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失败，从而发生了广泛的面向下层社会的启蒙运动，文学与政治相结合，文学的地位日趋上升。与西方自然地发生的现代化进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是按照西方，是按照知识分子的设计自觉地、